

就 社 會 層 面 談 兩 岸 未 來 發 展

● 金 耀 基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分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國民黨主導的中華民國的統治之下，過去五十年，中共與國民黨隔著台灣海峽各別統理大陸與台灣。在一定的意義上，兩黨一直處於敵對與競賽的局面。

不 同 的 現 代 化 道 路

中共與國民黨在大陸與台灣的統理，都有強烈的發展意識，也可以說兩者都有現代化的企圖心，但中共與國民黨卻走上兩條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前者走的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以計劃為主），後者走的則是三民主義，或更確切的說，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以市場為主）。值得提出的，二者在推動現代化上都是黨政合一的「黨國體制」。不過，大陸的「黨國體制」是「全能性國家體制」(totalistic state system)，黨國不止征服社會，並且經理社會，通過合作化、集體化及公社化的過程，黨國把「社會」的獨立性與自主性連根拔掉，社會成爲一個虛弱而無力的國家的依附體。這情形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高峰。其相應於現代化的表現上則是處世界各國的極低位。直到一九七八年鄧小平開始的開放、改革，「黨國體制」發生質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更使大陸的現代化擺脫了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羈勒。黨國的控制自覺地從社會、經濟各層面逐漸退出，一九八二年，十二大提出「以計劃經濟爲主，以市場調節爲輔」的方針，一九九二年，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此，大陸的「國家社會主義」已大幅轉向「市場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過去二十年的大陸，可說真正出現「敢將日月換新天」的局面，中國現代化從經濟方面一步步推向社會、文化領域，並已倒轉來開始影響政治體制。誠然，迄今，「市場化」程度，還不足百分之三十五。（顧海兵，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判斷，〈改革〉，一九九五，(1)八五—八七），但「社會」已從國家計劃的不斷擴大的缺口中形成本身的實體地位，今天，大陸雖還未有見「公民社會」之出現，但一個相對於國家的獨立的、自主的「社會」已經在經濟市場化的發展下逐漸形成。應注意者，黨國的力量仍然強大，事實上它自始

是大陸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

大陸轉型增長快速

大陸的現代化主軸的變化是從傳統性的農業社會轉向現代的工業社會。它的主旋律則是經濟體制的改革。在過去二十年中，經濟增長的速度是史無前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九十年代，幾乎是超過兩位數的增長。一九七八年改革之始，GDP為三六二四·一億元（人民幣），人均為三七九元，到一九九七年則為七四七七·二億元，人均增至五六三七以上，十九年平均年遞增九·八倍。在產業結構上，一九七八年的GDP中，第一產業（農）佔百分之二八·一，第二產業（工業與建築業）佔百分之四十八·二，第三產業（服務業）佔百分之二十三·七，到一九九七年則第一產業佔百分之十八·三，第二產業佔百分之四十九·二，第三產業佔百分之三十二·五，這標誌著大陸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快速轉型。另一現代化的現象則顯示在城市化上，據一九九七年的資料，農村人口仍佔百分之七〇·一，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九·九，遠遠低於世界城市化率（百分之四十七）的平均水平。大陸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大陸在六十年代建立的戶籍制，在戶籍制改革試點後，隨著二、三產業之繼續發展，據估計到二〇一〇年，中國大陸的城市化水平可以達到百分之四十五，（陸學藝〈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結構〉，收入胡耀蘇、陸學藝編《中國經濟開放與社會結構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p.10-21）

農村巨變價值改觀

中國大陸的社會之巨變，最值得注意的是農村這一環節，而導引農村經濟與社會結構發生變天現象的則是鄉鎮企業。由於鄉鎮企業之異軍突起，大陸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佔全社會勞動者的比重已由一九七八年以前的百分之八十，下降到一九九四年百分之四十四。一九七八年鄉鎮企業職工人數為二八、一二六·六萬人，一九九六年增加到一三、五〇八·三萬人，一九九六年，大陸國有經濟單位職工總人數為一一、二四四萬人，亦即鄉鎮企業職工已超過國有經濟單位職工。這是大陸農村的大變化，也是大陸社會的大變化，（參何秉孟〈鄉鎮企業與中國社會結構轉型〉，收入胡耀蘇、陸學藝編《中國經濟開放與社會結構變遷》，pp.139-150）。

鄉鎮企業在大陸的社會引出了「非農化」現象，「非農化」一方面表現在農人身分的轉變，即農人從事於非農的產業（農民工），一方面表現在農村社會轉化為非傳統式的「城市化」現象。以農村內部的經濟結構來看，一九七八—一九九四年間，農業產值佔村社會總產值的比重由百分六十八·六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七，而非農業產值則由百分之三十一·四上升到百分

之七十四·三。一九九三年，農村的國內生產總值位全國的百分之五三·二，首次超過了城市的百分之四十六·五。這顯示了農民的勞動力的大規模分化，一九九六年，農業勞動力轉到非農業的有一·三五億，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百分之三十，另外還有六、〇〇〇至七、〇〇〇萬跨地區農民工，亦即從事非農業的農民總數約為二億左右，（參郭書田〈中國農村勞動力分化與社會結構〉，收入胡耀蘇、陸學藝編《中國經濟開放與社會結構變遷》，pp.377-387），再從鄉村「城市化」過程看，一九七八年，農村勞動力為三〇、六三八萬人，其中二、八二六·六萬人進入鄉鎮企業佔農村勞動力的百分之十，一九九六年農村勞動力為四、五〇四·一萬人，其中鄉鎮企業人員為一三、五〇八·三萬人，佔農村勞動力的百分之三十。這使古老農村出現了新的社會群體，即企業家階層，為古老農村的驚天動地之變，而市鎮非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由一九八〇的一九·三九%，提高到一九九六年的二九·三七%。中國城市化過程之加快，與小城鎮的發展不能分開。一九八九年，全國有建制鎮七九五六個，一九九六年已增至一七七七〇個，十年中小城鎮增長一二三%，速度奇高。總之，「非農化」的結果是二十年來對傳統城鄉二元經濟、二元社會的大突破。在這一過程中，傳統農村的家庭結構（每戶三—四人的佔七〇%以上），價值觀念，文化質素都發生了激烈變化。無庸諱言，鄉鎮企業在大陸社會現代化中起了重大作用，不過，它在未來將面臨本身結構上的調整，以適應新的競爭環境，而鄉鎮企業在農村大地造成生態環保問題將是大陸在二十一世紀初必須面對解決的。

中產階級民間社會

台灣過去五十年的發展，是一個相當成功的現代化故事。一九四九年後，統治台灣是以中國國民黨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亦即是一黨、政高度結合的「黨國體制」。台灣的經濟發展是由這個「黨國體制」自上而下推動開來的。台灣的發展策略是由農村的土地改革起始的，接著是連續的幾個四年經濟計劃，導致了快速的工業化步伐，使台灣取得「新興工業國家」的地位。在這個過程中，黨國始終扮演了主導與催化的角色。六十年代時，四十八%的工業生產來自公營企業，但到了八十年代，這個比重已跌到十四%，民間的私營企業已遠超過政府公營企業。這個不斷擴張的市場經濟在七十、八十年代愈來愈有自主性。這時，不止已出現一個擁有財富的企業家階層，中產階級的人也已達三十%，而一個越來越有獨立性的「民間社會」不知不覺形成了。自七十年代始，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局面一步步受到挑戰，到了八十年代，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湧現了，這些運動強烈地顯示「民間社會」已擺脫了依附於國家的性格，並成為抵制國家的實體。在一定意義上，台灣的民主化是由一個日漸強化的市場社會向壟斷性的「黨國體制」的挑戰而展開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的「黨國體制」本身的轉化使台灣能順利地納入民主化的軌道。蔣經國總統在八十年代之決心開放黨禁，不啻宣布「一黨政治」，也即「黨國政制」的結束，到了九十年代

，台灣在政治上已有力地形成多黨政治的民主體制（參金耀基《中國政治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頁九
九—一二四，一二五—一二六），在經濟上，從其產業結構看，農業在國民總生產值中只佔二·七%，工業佔三四·九%，而
服務業佔六二·四%，以此，台灣已遠遠脫離農業社會，並已漸漸走上後工業社會的軌道上去。

從敵對到交流過程

大陸與台灣五十年來，隔著海峽，各別在不同的發展模式上發展，並且各別長期屬於冷戰時代的二個敵對陣營。兩岸之所
以開始有交流，主要是大陸一九七八年有鄧小平的「第二次長征」，大陸的開放、改革，固是中共自救之路，但也開啓了台灣
、香港兩岸三地的互利性的互動，而在全球化趨勢日益擴張之下，兩岸的交流與合作的空間必然更多更闊（可預見在今年年底
前，大陸與台灣都將進入WTO）。二十年來，大陸的現代化，特別是經濟方面，已取得驚人的發展，一九九五年，它的國內
生產總值達六九八九萬美元，居世界第七位。誠然，如以人均GNP來說，則只有六二〇美元，落到世界第八十一位，而台灣
的人均於一九九五年達一一二七六美元，兩地相差甚遠，不過，這種差距不是阻礙，而是促進兩經濟交流合作的因素，今日兩
地貿易總額達二四四億五千萬美元（一九九七年），順差達一六六億二千萬美元。

兩岸的大陸與台灣在文化價值方面，儘管因受不同程度的現代化的影響而有差異，但在根本上仍有中國文化的基礎。就政
治文化而言。對民族主義與集體主義，兩地社會都有中等程度以上的共識，大陸有八成以上，台灣則仍維持在六成左右，至於
對民主權力的價值取向，大陸人眾對平等權、人民主權、自由權力、社會多元權，及政府機關制衡權力方面，都是負面取向大
於正面取向，而台灣在平等權、主權、自由權方面都有中度的共識，而在社會多元權與制衡權力方面則負面取向大過正面取向。
（參朱雲漢、張佑宗《華人社會民主與威權體制的文化起源：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三地的比較研究》，收入劉兆佳主編，《
華人社會的變貌：社會指標的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一九七八，頁二五七—二八五）。

理性規範縮短差距

大陸與台灣的經濟差距，不會是兩岸交流的阻礙，但二地在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則會影響兩岸之合作。我以為在大陸現代
化的持續發展下，兩岸的差距會縮短，而差異亦會變小，當然，這還需要有一段歷史過程。整體性來看，大陸與台灣的經濟，
社會的發展基本上會需要兩岸持續增高的交流，而兩地的政治如何適當地掌握兩岸互通的方式與速度，而形成一理性的規範秩
序，則是對兩地政治領導層的智慧的考驗了。（本文中大學術基金會楊潔豪、汪清澄提供，小標題為編者所加）